



经济学家建议将 GDP 增速从宏观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

GDP 考核与治理环境目标发生冲突。专家指出，许多地方政府引入和上马了许多可能带来 GDP 增长但却是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密集型的项目。GDP 考核体制与国家要求的改善空气、水、土壤质量、建设生态文明之间形成了明显的矛盾和对立。要真正强调绿色发展和美好环境，就必须弱化以 GDP 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模式。

GDP 考核导致数据作假。专家们普遍认为，由于 GDP 增速是地方政府业绩的主要考核指标，导致了普遍的作假行为。王小鲁指出，由于地方政府追求 GDP，不断给下级政府下任务，而任务又完不成，下级政府只好虚报造假编假数据。最近辽宁、天津和内蒙古突然大幅下调 GDP 数据，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往下调整近 30%，也表明了 GDP 数据作假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二、建议将 GDP 从宏观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

专家们一致认为，为了避免过度追求 GDP 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应该采取实际措施弱化 GDP 指标在宏观调控和政府业绩考核中的作用。多数专家认为，应该将 GDP 考核从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改为预测指标，保留其对预期的引导和其他工作的指导参考作用，而弱化其业绩考核的功能。也有专家认为，弱化 GDP 作为核心调控目标的第一步可以考虑采用一个较宽的 GDP 增速目标区间并显著降低 GDP 增速目标。

张斌、马骏等专家认为，现代化宏观调控体系的主要目标应该包括稳定就业、控制通胀、维护金融稳定。由于金融稳定很难有一个典型的指标来描述，因此在多数国家的核心宏观调控目标就是合理的失业率(或区间)和通胀率(或区间)。在中国，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下降(2011 年劳动人口就开始下降，去年下降 500 多万人，不远的将来劳动人口降幅可能达到年均 700 万、800 万)，GDP 增速与就业改善之间的正相关性(奥昆定律)已经被打破，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可能出现负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中 GDP 增速目标与就业稳定目标之间只能二选一，否则就会出现目标之间的冲突。由于就业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基础，因此宏观调控核心指标中应该选择就业而舍 GDP。

建议将 GDP 增速作为预测而非考核指标。当然，用就业代替 GDP 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之一，并不意味着 GDP 这个指标就不存在和不发挥作用了。马骏、王小鲁、魏加宁、席睿德、汪涛等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将 GDP 增速从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和考核指标)改为预测或监测指标。根据国际经验，一般政府权威机构(如央行和财政部)会每年发

布一个年度 GDP 增速的预测，财政部门可以根据名义 GDP 的预测值编制财政收入预算，企业也会参考 GDP 的预测值来规划投融资活动的销售、生产和投资活动的增速，资本市场也会参考 GDP 的预测值来规划投融资活动。建议我国发改委每年初发布一个当年的 GDP 增速预测，并同时发布通胀指标的预测。为相关部门和企业的规划提供参考。但能否达到 GDP 预测值不应该再成为中央政府评估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评估下级政府业绩的主要因素。

如何处理失业率目标。席睿德说，G20 国家中绝大多数都已经采用稳定就业作为主要调控目标。G20 其他经济体中已经没有其他像中国这样有硬性的 GDP 增长目标的国家。马骏建议，我国可以设定一个稳定就业的区间目标，比如说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4.5%到 5.5%之间，由于区间比较大，不会像追求 GDP 增长点位那样导致过度刺激、扩张信贷、提高杠杆率的压力。

汪涛提出，也可以考虑将 GDP 增速的目标改为 GDP 增速区间。因为是一个区间，也就成为了一个监测性目标，相应弱化了其作为考核指标的职能。她认为，另外一个是可以考虑的办法，就是将 GDP 增速目标明显降低，即把底线降低，这样就不容易导致负债冲动和作假等问题。

宏观调控目标与地方政府考核指标的关系。专家们建议以稳定就业、控制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指标不宜过多，否则会造成信号混乱，目标之间发生冲突。

三、不应夸大弱化 GDP 导向可能带来的问题

专家们还讨论了弱化 GDP 导向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副作用问题，包括就业数据是否会被作假，失去 GDP“抓手”是否会导致地方政府不作为和经济失速，没有 GDP 目标是否就无法编制年度财政和投资计划，放弃 GDP 增速目标是否会与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发生冲突等。讨论的初步结果是，这些问题或副作用可能都被习惯性地夸大，它们不应该成为阻碍宏观调控导向改革的实质性理由。

调查失业率是否会被作假？一些学者担心，如果调查失业率成为调控目标和考核指标，是否又会导致失业率的数据造假和地方政府对失业率数据的干预。针对这个问题，与会专家表示，不应夸大失业率数据作假的风险。最近统计制度改革后，把所有城市调查失业率的统计职责划归到国家统计局直属，地方干预的可能性已大幅下降。因为负责统计调查失业率的调查总队人员不是地方任命的，它们没有权利干预调查总队的人事。关于

某些单位(如大学)是否会干预失业率数据，专家表示，调查失业率不是向单位调查，而是向十几万个住户调查，样本不是学校，地方和学校无法直接修改住户提供的就业数据，为了数据好看而提供临时工作的成本则是很高的。

弱化 GDP 导向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和地方政府不作为？有观点认为，虽然旧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在提升 GDP 导向是否会加剧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象以及导致经济失速的风险。

马骏指出，目前的主要风险不是经济失速，而是追求高增长所导致的杠杆率快速上升、金融风险加剧、环境恶化等问题。马骏的研究团队用几个经济数量模型的估算显示，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GDP 增速即使在几年内降到 6%或稍低，也不会导致明显的失业问题。我们不能既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又老是担心失速。

取消 GDP 考核目标会不会使财政和投资计划失去抓手？有人担心，若没有 GDP 目标，是否会导致财政部门无法编制财政、税收计划，是否会无法规划投资项目？专家们指出，建议将 GDP 从调控目标改为预测指标，并不是要“取消”GDP 这个统计指标本身。所有以就业为主要调控目标的国家都还继续统计和报告 GDP 数字，也都能编制其财政、金融和发展的规划。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由一个权威机构(如央行或财政部)发布一个年度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济预测编制财政收入和支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编制财政预算和政府投资计划。我国也应该以 GDP 预测为基础编制财政收支计划和政府投资计划，有无 GDP 调控目标并不影响财政运行和政府投资。

放弃 GDP 增速目标是否与中长期规划发生冲突？有人提出，我国在各种官方文件中曾经明确了 2010 到 2020 年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到 2035 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2050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没有 GDP 目标，是否就无法实现上述承诺？专家们指出，十九报告已经不再提 2010 到 2020 年翻番的目标了，就是要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未来发展的重点是要追求质量而非(由某个指标所规定的)数量。至于对 2035 和 2050 年的目标和内涵的诠释，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业机会和环境、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质量，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并不关心的 GDP 规模上。另外，从现到 2050 年还有 32 年，其间可能会发生许多不可预测、不可抗拒的事件，这些事件都可能会大幅影响 GDP 的实际增速，现在就要预知 32 年之后的 GDP 的绝对水平是不尊重科学的。(宗和)

▶▶▶ [上接 A2 版]

细数中外顶尖女经济学家

Janet Currie(珍妮特·克里)
Currie 是普林斯顿大学健康福利中心的讲座教授(Henry Putnam 早期)的研究关注儿童健康与福利、公共卫生干预计划、公共健康保险扩展计划、公共住房以及食物与营养计划。Currier 和她的同事 Anna Aizer 去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其中指出收入不平等可能会通过母育缺陷传递，主要是通过影响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来实现。他们写到：“出生时的健康状况是预测孩子未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身体缺陷等的重要指标。目前的研究显示，母育缺陷可能通过某些途径影响孩子出生时的健康状况，这些途径包括不健康的习惯、暴露在卫生糟糕的环境中，更差的医疗照顾等等。”

Asli Demirgüç-Kunt (阿斯拉·德米尔古茨-昆特)
Demirgüç-Kunt 是世界银行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在 1989 年就加入了世界银行。在这里，她不仅启动了《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发展报告》(World Bank's Glob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port)，还指导了《对国家在经济中作用的反思》(2013)(Rethink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e)以及《惠普金融计划》(2014) (Financial Inclusion)等。

至今，Demirgüç-Kunt 已经出版了超过 100 本作品，这些作品涵盖银行业危机、财政调控以及金融服务途径等主题。在她去年和 Deniz Anginer 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她指出，通过要求增加银行业良性资产比例来加强对它们的监管，有助于减缓金融危机中常见的系统性风险。就像他们总结的那样：“我们的研究证明，更高的良性资产比例是一个能吸收损失的缓冲垫，能够有效减少系统性风险，例如集体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对手风险。”

Esther Duflo(埃斯特·迪弗洛)
Duflo 不仅是麻省理工学院主教授扶贫开发经济学的讲座教授 (Abdul Latif Jameel Professor)，她还是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的联合创始人兼主任。此外，Duflo 还是达沃斯

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在她的职业生涯中，曾经获得印孚瑟斯奖(Infosys Prize)、大卫·克肖奖 (David N. Kershaw Award) 以及麦克拉克天才奖 (John Bates Clark Medal) 以及麦克阿瑟天才奖 (MacArthur "Genius Grant" Fellowship)。Duflo 的研究领域包括健康、教育、普惠金融、环境和政府等。除此之外，Duflo 还特别关心扶贫政策的制定过程。她于 2011 年和 Abhijit Banerjee 合著了《贫困经济学：对抗击全球贫困措施的彻底反思》一书。在这本书中，她号召要对当前全球的扶贫措施和政策进行一次彻底反思。这本书在 2011 年赢得了《金融时报》以及“高盛商业著作”年度奖。

Carmen M. Reinhart(卡门·莱因哈特)
Reinhart 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金融体系的讲座教授 (Minos A. Zombanakis professor)，她还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顾问小组以及美联储经济顾问小组的成员。在 2009 年，Reinhart 和 Kenneth Rogoff 合著了一本畅销书叫做《这次不一样：800 年金融荒唐史》。在这本书中，他们列举了许多繁荣与萧条的历史事例，还对这些事例中的共性进行了比较。

最近，Reinhart 和 Christoph Trebesch 合作发表了一篇有关主权债务减免及其影响的文章。他们的研究表明，债务国在债务减免后的五年内会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但会对债务国的信贷前景产生一定影响。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

“1920—1980 年间发生的所有金融危机，都仅有一个共同的出口，那就是债务得到减免，以及债务减免后的 1934 年就出现了复苏，以及布雷迪债务减免后的 1990 年复苏。这些过往的经验为目前有关希腊、乌克兰债务减免的争论提供了一些解决思路。”

国内顶尖女经济学家

冯兰瑞
在中国经济学术界影响最大、学术成就最成功的女性，无疑是冯兰瑞先生。冯兰瑞先生早年求学于贵阳达德学校，1938 年入党，1940

年赴延安，先后在青年工作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后考入中央军委编译局主办的外语学校英文队学习。1954 年进入中央上海《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教学生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马列教研室主任、黑龙江省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黑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研究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经济学报》社长。主要著作有《劳动报酬和劳动就业》、《按劳分配、工资、就业》、《论中国劳动力市场》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镇待业问题逐渐暴露，为了研究体制改革和劳动就业问题，冯兰瑞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完成了很多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文章，她系统阐述了在劳动就业问题上的观点，是国内最早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1980 年，她发表《劳动就业问题六议》等研究我国劳动就业的文章，1982 年，她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就业理论》的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业理论的必要性。

1988 年，冯兰瑞先生率先提出以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取代行政配置和劳动力的商品性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她在经济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冯兰瑞先生被国外誉为“一位成功的中国女士”。

江春泽
江春泽是享誉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她 1935 年生于安庆，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等单位工作，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论工业生产专业化》、《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南斯拉夫》、《苏联东欧经济管理体质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世界经济概论》、《社会主义计划》、《比较经济体制学概论》等。

江春泽的最大理论贡献是社会主义与市

场经济兼容理论。在《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和《比较·选择·前景——苏联国家与我国处理计划与市场作用的不同作法、不同效果》文章中，江春泽针对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根本特征的理论误区，阐明计划与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区别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在当时改革面临停滞倒退危险的关键时刻，这两篇文章发挥了明显的实践效果。

江小涓
江小涓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是我国经济学界少有的博学多才的女性。江小涓 1981 年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务院研究室工作。2003 年，江小涓被评为“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那时她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产业经济等，主要专著有《中国工业发展与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研究》、《经济转轨时期的产业政策》、《结构调整中的产业升级与发展》、《工业经济学》、《中国工业企业组织结构变动长期趋势》等。她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全国性学术成果奖。2009 年曾入选“影响新中国中国经济建设的 100 位经济学家”。

孙祁祥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孙祁祥教授，也是一位学术成就突出的女经济学家。她是湖南省长沙市人，1979 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学系，1989 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1992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至今。早在 1987 年，孙祁祥有一篇题为《根本出路在于改革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文开始在经济学界初露锋芒。孙祁祥在文章中提出了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形式在理论上是与商品经济对立的，是短缺经济的主要根源，传统的国家所有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改革传统的国家所有制不等于改变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等观点。1993 年《经济研究》刊登的“市场经济与竞争机会的平等”是孙祁祥发表的又一篇颇具影响的学术论文。这篇

论文一经发表并由《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重视。

当然，孙祁祥的最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保险金融。去年 6 月，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保险学会第 50 周年会上，孙祁祥教授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及对中国保险业的贡献，荣获了 2014 年度约翰·毕克利奖。这个奖是国际保险界的最高奖项，专门用来表彰对保险思想、实务或教育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其评奖委员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推选出一位获奖人。孙祁祥教授则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也是有此奖项以来的唯一女性获奖者。

作为继马寅初、陈岱孙、胡代光等大师级人物之后北大经济学院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长，孙祁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着她更努力勤奋地工作，辛勤耕耘，执着坚守，把北大经济学院的工作推上新台阶。

朱玲
朱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际农经学会 (IAAE) 执委和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曾参加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减少贫穷研究小组；目前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成员和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荣获 1993 年(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 年(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4 年(第五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8 年(第三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专著《减贫与包容：发展经济学研究》等五部论著获得“张謇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李善同研究员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女经济学家。她长期研究区域发展战略与产业政策，主要著作有《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型》、《中国中长期产业政策》、《中国地区发展与产业政策》、《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改革与政策》、《中国地区发展与政策》、《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宗和)(完)